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三卷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III

中华书局，2001 年 6 月

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

王力平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襄阳杜氏是关中郡姓杜氏的一个特殊支系。永嘉之乱后，杜耽——著名将军和学者杜预的儿子，带着他的族人定居江南。慢慢的，杜耽的家庭变得著名而且出色，他有许多后代在南朝占居高官。仅仅有杜乾光回到了北方进入了统治集团。在汉魏间杜乾光的后代移居到河南的洛阳和巩县，开始了由儒学世家向文学世家的转化。杜审言在初唐很是知名，他的孙子——杜甫更是把唐诗推向了高峰。然而，襄阳杜氏毕竟是在晚唐时期的一个独特个案，在从儒学世家向文学世家的转化中是有许多丰富的历史内容的。

关键词：儒学世家；文学世家；家族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襄阳杜氏是中古关中郡姓杜氏的一个支系。在林宝《元和姓纂》所记唐代杜姓 14 个郡望中，襄阳与京兆、濮阳、洹水、中山等属于地位显赫的郡望。¹而在本自《唐韵》、由宋人陈彭年等重修的《广韵》中，杜氏分京兆、襄阳、濮阳三望，也反映了唐中叶襄阳杜氏的客观存在。²然而《元和姓纂》以诗人杜审言、杜甫祖孙房支为襄阳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以玄宗名臣杜希望、德宗宰相杜佑父子房支为襄阳望。而此后的谱系文献又多因袭《新唐书》的说法，以致杜佑为襄阳望的说法流布甚广。³清人孙星衍说：“姓氏与郡望相属，乃知宗派所出。”⁴显然，杜审言与杜佑一支究竟谁应属于襄阳望，是必须首先予以说明的问题。

据杜佑《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序》：“京兆杜佑，远祖西汉建平侯（按此指杜延年），家于杜陵，绵历千祀。”⁵考诸史传，杜佑出自杜预次子杜尹之后。永嘉乱时，杜尹为西晋弘农太守，因率部伍退守洛阳一泉坞，为乱兵所害。⁶南北朝时期，杜尹子孙淹留北土，北魏末至东魏初，这一房支已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杜尹六代孙杜颢，为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

夫，有名于史传。⁷入唐后，颢裔孙行敏，官常州刺史、荆益二长史，封南阳襄公，是为杜佑曾祖。行敏生崇慤，为杜佑祖父；崇慤生希望，玄宗时官至太仆卿、陇右节度使。希望生佑等数子。总之，杜尹后人并无属籍襄阳的历史，相反，自杜颢开始，这一支子孙即以京兆之少陵为家族墓地，世世代代归葬少陵。⁸《新表》将杜佑归属襄阳望显然是缺少史实依据的。

此外，在唐代文献或当时人言论中，也绝无以杜佑一支为襄阳望者，如在权德舆所作杜佑遗爱碑及墓志铭中，均称杜佑出自京兆杜陵。⁹杜佑孙杜牧以及武宗朝作过宰相的杜惊兄弟，都自称“杜陵”人或被称作“京兆”人；而在唐朝人士心目中，真正的襄阳杜氏是杜审言、杜甫一支。如宋之问在与杜审言的送别诗《三月三日于灞水曲饯豫州杜长史别昆季序》中称：“言辞灞滻，将适荆河。恋旧乡之乔木，藉故园之芳草。”¹⁰显然，宋之问是把“荆河”看作杜审言的“故园”的。又如高宗时杜易简与吏部侍郎李敬玄发生冲突，李曾讥称易简为“襄阳儿”。¹¹总之，在唐代杜氏的众多支系中，杜审言、杜甫一支属于地地道道的襄阳望，杜希望、杜佑一支则与襄阳杜氏无涉。

那么，《新表》的错误又是如何出现的呢？从相关的史传资料来看，如果说杜佑先祖与襄阳有何特殊联系的话，恐怕要追溯到杜预在西晋平吴后曾驻襄阳，且刻石碑“纪其勋绩”，“立岷山之上”。¹²也正因此，晋以后杜氏子孙的封爵，也就有了“襄阳”字样，而杜佑父杜希望也因此得到过襄阳县男、襄阳公的封号¹³。估计《新表》作者误将杜希望的封爵等同于郡望（尽管两者有时是一致的），有关襄阳与京兆郡望的错误或许就是这样出现的。

上篇 从“中华高族”到“晚渡荒伦”

一、永嘉之乱与襄阳望的分立

永嘉年间，匈奴贵族刘渊、刘曜父子率众南下，先陷洛阳，继陷长安，掳晋愍帝至平阳，西晋遂亡。其时中原涂炭，士族纷纷挟宗族部曲南渡，如《晋书·王导传》所云：“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形成东汉以来又一次移民大潮。

永嘉之乱前，关中郡姓京兆杜氏正处在鼎盛时期，杜预四子杜锡、杜尹、杜跻、杜耽，¹⁴此时均已步入仕途并取得重要位置——长子杜锡为吏部郎、尚书左丞，¹⁵次子杜尹为弘农太守，¹⁶三子杜跻为新平太守，¹⁷少子杜耽为凉州军司。¹⁸但永嘉之乱打断了杜氏家族的正常发展，杜预诸子流徙播迁，杜锡一支子孙随晋室南渡，杜尹死于战乱，子孙分散，¹⁹杜跻后裔淹留北方，惟杜耽乱发时正滞留河西，为凉州军司，因而命运更加坎坷。据《元和姓纂》卷6杜氏襄阳望条：

当阳侯元凯少子耽，晋凉州刺史；生顾，西海太守；生逊。过江。随元帝南迁，居襄阳。逊官至魏兴太守，生灵启、乾元。²⁰

仅从字面上看，“过江，随（晋）元帝南迁，居襄阳”者，究竟是杜逊还是杜顾，并不明确。众所周知，《元和姓纂》“至宋已颇散佚”，至清更是“绝无善本，仅存七八”，²¹因此上段引文或有遗漏。以情理度之，杜逊为杜耽孙辈，永嘉之乱时是否已经出生尚值得怀疑；另外，从杜逊孙乾光仕南齐推算，杜逊活动的年代应晚于东晋初年。因此，随晋元帝南迁并定居襄阳者应该是杜顾，而不是杜逊。总之，杜耽之子杜顾，于永嘉之乱后即随晋元帝南渡，并在襄阳定居，总是事实。如此说来，杜耽应为襄阳杜氏的不祧之祖。

又据《宋书》65《杜骥传》：

（杜）骥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迁关中。²²

据此又知，杜耽另有一子，即杜坦、杜骥之祖父（《宋书》未记名字），此人永嘉之乱后随杜耽避难凉州，据《晋书》14《地理志》：

晋惠帝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

由于前凉政治安定，遂成为“秦、雍移民”（其中包括很多关中士族家族）的避难之所，杜骥祖父大概也夹杂其中，暂栖身河西。及苻坚平凉州，始迁返关中，直到宋武帝刘裕伐灭后秦（417年），杜坦、杜骥兄弟才跟随之过江。

总之，据以上两则史料可以确知，在杜顾之外，杜耽至少还有另一子（杜骥祖父），这一房的子孙坦、骥兄弟与杜顾的子孙灵启、乾光兄弟四人，是同出于曾祖杜耽的从兄弟。只是两房子孙的经历不尽相同，向南迁徙的路线和时间也迥然有异。杜顾一支永嘉之乱后迺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时间大约在公元317年以后不久；而杜骥祖父一支曾寓居河西，又辗转关中多年，他们南渡的时间大约为公元417年（刘裕伐灭后秦）后。总之，襄阳杜氏两大房支南渡的时间前后至少相差了100年。

陈寅恪氏在言及南渡士族问题时曾说：“至南来北人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住居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是也”；而集中在襄汉地区的南迁士族，则大体属于“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前者属“文化士族”，后者属“武人集团”。²³其实，杜耽后裔与其兄杜锡后裔的情况类似，所不同的是，锡子义（字弘治，？—321）南渡后即随晋王室定居在当时的首都建康，²⁴时值东晋政权初立，司马氏积极网罗北方士族中的“贤人君子”²⁵，在此背景下，杜义承父祖余荫，在江左士族中享有“才名冠世”的美誉，²⁶其女杜陵阳又为晋成帝皇后，²⁷杜义房支当然属于“过江名士”，只是在政治作为方面无法与王导等“胜流”相比。至于杜耽的两房子孙，最初也都属于“文化士族”，只是在南朝以及所居地襄阳这样特殊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逐渐发生了变化。

二、襄阳地域政治与杜氏家族的沉浮

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春秋以来属楚地，杜佑《通典》州郡七《古荆河州》这样记载其政治地理沿革以及政治军事地位：

襄州……魏武始置襄阳郡，亦为重镇。晋初因之，兼置荆河州。东晋侨置雍州。文帝割荆州置雍州。襄阳去江陵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自东晋庾翼为荆州刺史，将谋北伐，遂镇襄阳。田土肥良，桑梓遍野，常为大镇。北接宛、洛，跨对楚、沔，为鄢郢北门，部领蛮左。齐梁并因之，亦为重镇。后梁萧警附庸于西魏，而都于此。西魏改曰襄州，隋复为襄阳郡。大唐因之。²⁸

据此可知，魏晋以来，襄阳已兼有经济都会与军事重镇之双重地位。东晋以后，襄阳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据谭其骧氏研究，晋永嘉丧乱后民族迁徙的主要路线之一，在于“汉水流域，上自郢西、竹谿，下至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是区所接受之移民倍于本省其他二区，而来自陕西者为最多，河南、甘肃次之，河北、山西、安徽、四川又次之”。又据谭氏统计，当时全国南渡人口大约有90万，其中集中在湖北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侨民有6万人。²⁹可见襄阳在当时又成为甘陕移民的集合地。

为安置移民，侨郡县应运而生，据《宋书》37《州郡》三雍州刺史：

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

犹寄寓在诸郡界。

襄阳于是成为侨雍州的治所，汇集了来自雍、秦等地的挟宗族部曲集体迁徙的世家大族，如华山蓝田人康穆，宋永初中，“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岷南。宋为置华山蓝田县，寄居于襄阳”，即为典型的事例。³⁰又《晋书·祖逖传》、《徐邈传》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³¹在当时的荆襄地区，除杜氏家族外，还有萧氏、庾氏、宗氏、刘氏、柳氏等世家大族定居。³²由于晋宋之际“襄阳多杂姓”，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时，“使长史范顗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³³足见襄阳当时士族萃集之盛。

东晋成康以来，地处建康上游的荆襄地区一直是琅琊王氏与颍川庾氏权力竞逐的焦点，其后又有庾亮、桓宣两大势力曾为控制襄阳展开激烈争斗。³⁴刘宋时期，襄阳的政治军事地位和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如元嘉年间，刘秀之为襄阳令，兴工修复襄阳六门堰，溉良田数千顷，“雍部由是大丰”。³⁵太祖时，始以皇子镇襄阳，且将“文武悉配襄阳，襄阳地区的文化建设也随之展开，如沈亮为南阳太守，“时儒学崇建，亮开置庠序，训授生徒”。³⁶

杜耽后裔随宋武帝刘裕南渡后，定居襄阳，后子孙繁衍滋盛，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襄阳杜氏开始脱离京兆本宗而成为独立的郡望。襄阳杜氏的主要构成为活跃于刘宋时期的坦、骥兄弟，以及活跃于齐梁时期的灵启、乾光兄弟。现分述如下。

杜坦、杜骥房支

刘宋建立后，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都已发生了变化，“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³⁷据《宋书·杜骥传》记载：

（杜坦）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按金日磾乃西汉时匈奴休屠王太子，后降汉入侍武帝左右，数十年无过失，拜车骑将军。³⁸杜坦以日磾自比，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南渡较晚，即便是出自魏晋著姓、“中华高族”，杜坦、杜骥终未能进入刘宋权力中枢，在宋武帝永初至元嘉年间，杜氏兄弟先后担任青州刺史，在宋魏对峙与相互征伐中，为刘宋捍卫北疆，战功卓著。³⁹

然而，襄阳杜氏毕竟是根基深厚的“中华高族”，虽然未能如杜乂房支那样联姻王室，但他们很快就在主要来自西晋雍、司地区的晚渡士族中，建立起了相当广泛的婚姻关系，如《宋书·杜骥传》所云：“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又据《南史》58《韦叡传》：

叡（韦玄孙），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著姓……时内兄王澄、姨弟杜惔，并有乡里盛名……外兄杜幼文（杜骥子）为梁州刺史，要叡同行。

据此可知，杜骥、杜幼文两代均与韦氏通婚，而王氏也同时与韦、杜联姻。⁴⁰其中韦氏、王氏与杜氏情况相近，同为晚渡侨姓士族。在宋、梁时期，他们的宗族势力也都集中在荆梁地区。总之，韦杜、王杜家族之间世代联姻，多少带有政治盟友的意味。也反映出襄阳杜氏在南朝侨姓士族中仍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说明南朝士族阶层内部的“身份内婚制”特点的普遍存在，说明门阀士族社会还处在相当强固的状态中。

至宋文、武帝时期，杜坦、杜骥子孙已从最初的边郡太守逐渐跻身政权中枢，如杜骥第五子幼文，泰始至元徽中，先后为散骑常侍、黄门侍郎等职，后出任梁、南秦二州刺史，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家族势力达到鼎盛。⁴¹史称“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⁴²杜坦子叔宝则为右军参军，后挟制豫州刺史殷琰，成为左右豫州地方政治的“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⁴³襄阳杜氏家族势力的膨胀，最终招致刘宋皇室的不满，元徽五年，废帝刘昱“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等。幼文兄、长水校尉叔文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⁴⁴有关此支杜氏的子嗣，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全无踪影，估计隋唐时代已是后继无人了。

灵启、乾光房支

东晋初年，北来侨姓中的魏晋高门尚受到优崇，但因离政治中心建康稍远，此支人物虽为“元凯后裔，家传学业”，⁴⁵却未能进入权力中枢，在东晋政军两界，襄阳杜氏无甚建树，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在政治、军事领域各领风骚的局面相比，不免有些逊色。史称杜顾为西海太守，杜逊为魏兴太守，但均无甚事功可言。灵启为南齐给事中，其事迹亦不详。⁴⁶从灵启子怀珪开始，杜氏子嗣繁茂，子孙渐以武功显名。史称怀珪“少有志节”，累有军功，先后为梁、秦二州刺史。怀珪九子：嵩、岑、嶷、岌、猷、岸、崩、嵒、幼安，⁴⁷其中多以军功武略闻名一时者，如号称“杜彪”的杜嶷，“膂力过人，便马善射……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⁴⁸由于杜氏兄弟长期盘踞军事重镇，逐渐培植起了一方势力，成为远近闻名的“襄阳豪帅”。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作乱，杜猷、杜岸、杜崩特别是杜岑之子杜龛，在当时均处举足轻重地位，在平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⁴⁹

然而也在平乱的过程中，襄阳杜氏子弟几乎全部参与了梁宗室的权力之争，在萧绎（后为梁元帝）与萧詧叔侄之间，呈一边倒之势投靠了萧绎，结果，除杜崩病死于战场外，杜氏兄弟猷、岸及其“母妻子女”，尽为岳阳王萧詧所获，詧“并于襄阳北门杀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其幼稚疏属下蚕室。又发掘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⁵⁰此后，杜龛岳父王僧辩为陈霸先所杀，杜龛后在吴兴拥兵自重，但未能扩大势力，也为陈霸先所败，“其妻王氏截发出家，杜氏一门覆矣”。⁵¹在唐代谱牒文献如《元和姓纂》中，襄阳杜氏怀珪九子，只有杜嶷、杜崩两房尚存子遗，其他七房可能在南朝即已断绝了香火。

杜逊另有一子乾光，仕齐为司徒右长史。乾光著有《春秋释例引序》，流行于齐梁间。⁵²乾光子渐，为梁边城太守。渐生二子，君锡、叔毗。⁵³据《周书·杜叔毗传》记载：

叔毗早岁而孤，事母以孝闻。性慷慨有志节。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

叔毗“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反映出这个房支一直保持着儒学传统；而叔毗叔侄四人“各领部曲数百”，则意味着拥有大宗田产以及强大的宗族武装势力（南北朝时期部曲多带有私人武装集团的性质），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其他士族家族的情况推知，如《颜氏家训·止足篇》云：“……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⁵⁴可见在颜之推看来，有良田十顷、奴婢二十，即可“止足”。又《梁书》51《张孝秀传》称：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此外，梁时裴邃曾“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⁵⁵由此看来，叔毗一支确是势力相当强大的地方豪强，难怪叔毗降周后，周闵帝仍下令保护杜氏家族在梁州故里的“旧田宅”。⁵⁶总之，聚族而居，广占田产并拥有众多的佃客、部曲，为叔毗一支宗族形态的显著特点，也是其能在地方长期称雄的经济基础所在。

然而，侯景之乱和随后发生的江陵之变，是叔毗一支命运转变的契机，大统十七年（551），西魏大将达奚武围萧循于南郑，叔毗作为萧循使节至长安请和，从此留居长安。此后，杜叔毗一支比其它侨姓士族率先一步回归北土，进入北周统治集团。北周闵帝时，叔毗为都督、辅国将军、硤州刺史等职。天和二年（567），因率部南征伐陈，为陈人所害。⁵⁷

下篇 杜乾光后裔杜审言、杜甫房支的兴替

一、复归巩洛

自开皇九年隋文帝平陈，中国重新进入南北统一的时代，其间，士族家族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南北朝末年，选举制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反映寒门士子政治要求的变化，⁵⁸至北周末年颁六条诏书，其中“擢贤良”条已明确申明：“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⁵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隋文帝时废中正，创置科举，“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⁶⁰加之全国统一，西晋以来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为南北士子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于是乎“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⁶¹胡如雷先生在《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隋唐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列举了自北朝后期开始，原聚族而居的山东郡姓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关中郡姓如陇西“駝李”等大族，向洛阳、长安迁徙的众多实例。⁶²总之，对士族家族来说，科举制度创置所带来的冲击是相当深刻的。唐末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士族子弟背井离乡、追逐科第的故事很多，如先天年间，山东士子王泠然为猎取科场功名，“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园”，辗转漂泊，居无定所，⁶³就是时代潮流冲击下士族子弟处于普遍变动状态的典型。

那么，时代变革给襄阳杜氏家族的历史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如前所述，江陵之变后，襄阳杜氏叔毗一支实际上已经进入关中士族行列。据《元和姓纂》及《北史·杜叔毗传》，叔毗生廉卿、冯石、安石、鱼石、黄石五子，其中，鱼石为隋河内郡司功参军、获嘉县令，⁶⁴其他四子仕宦不详。从叔毗在北周的职位——都督、辅国将军、硤州刺史来看，鱼石等人或许有可能由门荫入仕。但是北周至隋初恰是选举制度发生变化的时期，先是苏绰典吏部，“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入隋以后，“选无清浊”的趋向更为明显，直至进士科出现，科举制渐渐得到推广。在这个背景之下，鱼石之子依艺为河南巩县令，未必得益于祖父叔毗的门荫。当然，在缺少史料的情况下，这些也只能是推测而已。无论如何，自叔毗仕北周、鱼石仕隋，直至依艺任巩县令并定居巩洛，襄阳杜氏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迁徙。自永嘉之乱前杜耽离开洛阳算起，在大约 300 年后，其子孙后代又复归中土，而此时襄阳杜氏的籍贯实际上已再次与郡望分离。这也是或称杜审言为河南洛阳人的原因。

二、家学与家风

入唐以后，乾光后裔的发展方向开始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儒学世家演变为文学世家。众所周知，早在汉初杜氏家族兴起之际，杜周、杜延年父子以刑名之学闻名于世。汉魏之际，杜氏子孙开始归宗儒学。从杜畿开始，杜氏祖孙三代在《左传》研究方面独擅其长，特别是杜预，于平吴后“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⁶⁵杜预的《左传》系列著作问世后，很快风行一时，尤其在东晋南朝，习《左传》者咸尊杜注，在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南学”学派中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为“左氏功臣”。⁶⁶

从京兆本宗析出的襄阳杜氏，最初并未丢弃儒学传统，如杜坦、杜骥兄弟，“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学，故齐地多习之”。⁶⁷只是其子杜幼文辈渐为驍悍武人，终遭杀戮，

儒学传统在此房支遂致废绝。相比之下，乾光家族仍旧保持着儒学传统，乾光、叔毗祖孙在学术渊源上继承了杜预《左氏春秋》学的传统，并有所成就。⁶⁸然而大约在隋唐之际，亦即鱼石、依艺两代，襄阳家族开始由儒学世家转向文学世家。促成这个转变的，除去时代学术文化发生转变这一历史因素外，还与侨姓士族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

周隋以后，由于关陇军事贵族在权力中枢处于核心地位，迁入关中的江南士族和回归关中的侨姓士族，只有竞技科场方有望跻身仕途，这是他们谋求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自杜叔毗以后襄阳杜氏家族不再抱住《左氏春秋》不放，而是适时转向了文学的又一个原因。杜甫曾勉励其子宗武：“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⁶⁹可见此时襄阳杜氏的家学方向已相当明确。虽然鱼石、依艺以及审言，在隋唐之际仕宦多为令丞低品，社会地位较为低微，但皆有“文学俊异”之称。⁷⁰易简九岁能属文，进士及第，博学有高名，颇善著述，有《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⁷¹审言少即成名，亦进士及第，⁷²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有文集十卷流传。⁷³在唐初，文坛江左余风占据主流，文学形式仍推崇南朝，而身为侨姓后人的杜审言积极倡导六朝诗风，如明人胡应麟称：“唐人句律有全类六朝者”，惟杜审言“啼鸟惊残梦，飞花揽独愁”句；至于清人王夫之则称：“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始叶于度。”⁷⁴杜审言的诗风对杜甫也有深刻的影响，如清人施闰章《蠖斋诗话》所说：“杜审言排律皆双韵，《和李大夫嗣真四十韵》，沈雄老健，开阖排荡，壁垒与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尔旌旗整肃，开疆拓土，故是家法。”可见在梁陈以来“近体诗”发育过程中，杜审言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这说明，在中古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整合过程中，像杜审言这样亦南亦北的侨姓家族曾经起到了一种媒介的作用。

审言子杜并，少年即“日诵万言，尤精翰墨”，只因早卒，未能施展文学抱负。⁷⁵

至于杜甫，少年时代即“出游翰墨场”，自信“扬雄、枚皋可企及也”。⁷⁶有文集六十卷流行。⁷⁷因杜甫在中古诗歌创作上的地位和成就文学史上已早有定论，故在此不再申论。

陈寅恪氏曾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⁷⁸可见家学与门风之间一般情况下是有密切关系的。襄阳杜氏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经历了从“中华高族”跌落为侨寓“荒伦”的变故一样，这个家族的“门风”也无法以“优美”来论说。在杜叔毗至杜并四代人中，侠义之士辈出，如叔毗出使北周时，其兄锡及侄映、晰并为曹策等害。后曹策亦至长安，叔毗“志在复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剖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请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气，特命舍之”。⁷⁹叔毗后为陈人所擒，亦辞色不挠，慷慨就义。杜鱼石女、王珪妻也以侠义闻名。⁸⁰杜审言次女、杜甫姑母裴荣期夫人则有“义姑”之称。⁸¹至于杜审言子杜并，更是为人称道的刚烈少年——当其父审言为同僚周季童陷害下狱时，并“盐酱俱断，形积于毁，口无所言。因公府宴集，手刃季童于座”，并也当场为府署左右鞭挞而死。⁸²至于杜甫，性情之中也有豪侠的一面，安史之乱间，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甫上书为琯申说，虽近于迂阔，却也不失质直本色。⁸³

侠行义举，是对儒家所崇尚的忠信孝悌信条的实践，因此襄阳杜氏的家风只是传统士族家风的一种变形而已。而这种家风的形成，最主要的，还与其特殊的家族历史有关。在公元四世纪至九世纪的大约500年间，襄阳杜氏家族一直处在不断的迁徙中，漂泊不定的生活，起伏跌宕的命运，或许影响及于家族成员的心理层面，以致形成了诸如豪爽侠义、狂放不羁等等心理和行为特征。

三、杜审言家族的婚姻

玄宗天宝三年，杜甫继祖母卢氏去世。祔葬偃师之际，杜甫代父杜闲作《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⁸⁴其中列举了前来赴丧的“内宗外宗”约三十人。现据此墓志并结合有关史

传材料，做出隋唐时期襄阳杜氏家族婚姻表如下：

人物（依辈分排序）	姻家	郡望	联姻时代	史料出处	备注
鱼石女	王珪	乌丸王氏，梁王僧辩孙	周隋间	杜甫《送王砒评事》	南朝时襄阳杜龔曾娶王僧辩女
审言	前娶薛氏，继娶卢氏	一为河东郡姓；一为山东郡姓	隋末唐初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闲	前妻崔氏，继妻卢氏	均为山东郡姓	唐武则天、中宗时期	张说《义阳公碑》 ⁸⁵	
审言子	郑氏	山东士族	高宗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⁸⁶	
审言子（专？）	魏氏	钜鹿	高宗以后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审言子（登？）	王氏	山东郡姓	高宗以后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登为武康县尉
审言长女	魏上瑜	钜鹿	高宗以后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县丞
审言次女	裴荣期	关中郡姓	高宗以后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王府录事参军
审言次女	王佑	京兆，应为山东郡姓之分支	中宗以后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审言次女	贺撝	会稽	中宗以后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审言次女	卢正均	山东士族	中宗以后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	郡司仓参军
甫	杨氏	关中郡姓	中宗以后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	司农少卿杨怡女

				君墓志铭并序》 ⁸⁷	
闲女（甫妹）	韦氏	关中郡姓	中宗以后	杜甫《赠韦丈》 ⁸⁸	

按此表共统计 15 人（杜审言、杜闲前后两娶），时间断限在隋唐之际至安史之乱前之天宝三年，大略可以反映襄阳杜氏在隋初至唐天宝时期的婚姻状况。

综合上表，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没有与王室联姻；⁸⁹第二，与山东士族通婚 7 例，占总数的 46%；与关中士族（关陇贵族）通婚 4 例，占总数的 26%；与一般中小官僚子弟或曰庶族通婚 3 例，占总数的 20%。

此外，从襄阳杜氏姻亲的姓氏来看，主要有王、卢、魏，以及崔、薛、裴、贺、韦、杨、郑诸姓。其中与王氏通婚 3 例，与卢氏通婚 3 例，与魏氏通婚 2 例，与崔、薛、裴、贺、韦、杨、郑各 1 例。

如前所述，王氏中王僧辩（王珪祖父）一支，韦氏中韦叡一支以及河东裴氏家族，都曾有过南渡的历史，而这几个家族，一直与襄阳杜氏保持着婚姻关系，南北朝时期如此，隋唐时期亦如此。至于崔、卢、郑、王等山东著姓也与襄阳杜氏联姻。

总之，隋唐以后，随着迁居洛阳，襄阳杜氏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婚姻关系。从这个婚姻网络的辐射面来看，其社会联系并不封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唐初山东士族竞相炫耀门第、所谓“卖婚”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崔、卢、郑、王等著姓都与襄阳杜氏联姻，这种情况既反映出襄阳杜氏家族文学声誉鹊起，在士族社会博得较高的声望以外，还反映出隋唐以后，山东士族与关中郡姓之间，甚至于士族与庶族之间，在婚姻关系上并非壁垒森严。⁹⁰

四、杜审言一支的衰落

至唐中叶，士族阶层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魏晋旧门无力保持其原有的政治地位，陷于贫困，如《新唐书·高俭传赞》所云：“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而另一部分士族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保证了珪珣蝉联。例如清河崔氏家族，在宪宗至文宗两朝，崔邠与崔郾、崔郾、崔郾等兄弟六人及邠子崔璠、崔璠等，“皆登进士第，历位台阁”，“仕宦皆至三品，邠、郾、郾三人，知贡举，掌铨衡。冠族闻望，为时名德”。⁹¹又如范阳卢氏，在德宗贞元至僖宗乾符初年的九十余年间，“登进士者一百十六人”。⁹²这说明根基深厚的山东旧族崔、卢两姓，相对于一部分家道中衰、走向没落的士族而言，唐中叶后子孙后代不仅没有式微，反而跻身权力中枢，顺利完成了从门阀士族向新型官僚贵族的蜕变，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襄阳杜氏家族却属于“早衰”的类型。杜易简虽进士及第，但仕宦不达。杜审言亦举进士，⁹³曾为洛阳丞、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等职。但因涉嫌与张氏兄弟交往，在崔玄暲、张柬之发动兵变后，被放逐峰州。⁹⁴至中宗广招天下文学，审言被召还为修文馆直学士，但旋即去世，享年六十余。⁹⁵审言子闲，科第无名，终奉天令。闲生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虽“少贫不自振”，但性情旷放，怀抱高远，每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勉。⁹⁶与父祖一样，杜甫同样无法摆脱功名的羁绊，只是未能进士及第，仕宦不继，因此生路更为坎坷。待杜甫成年后，家道中衰，所谓“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⁹⁷虽然杜氏家族在长安杜曲、洛阳偃师及巩县有微薄产业，⁹⁸但也仅可免于躬自耕耘之苦。天宝中，杜甫由洛阳移居长安，处境日下，

其《示从孙济》诗所云“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跖，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等句，⁹⁹更像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避走三川，历尽艰辛，以至“自负薪采椽，儿女饿殍者数人”。¹⁰⁰后流落剑南，为西川节度使严武幕僚。大历中，杜甫出瞿唐，下江陵，至耒阳时，贫病而死。¹⁰¹

杜审言、杜甫家族的衰落，原因是复杂的。隋唐以后，是否获得科场功名与家族兴衰有直接关系。杜审言后，杜闲、杜甫两代均无缘进士，子孙也未能射取功名，遂无以致身通显，光复家业。¹⁰²此外，东晋以来，襄阳杜氏作为侨姓士族，定居南朝近200年，但他们的根基仍无法与吴姓土著相比。回归北朝后，由于远离故土，多历年所，他们已无法与道地的、政治经济基础雄厚的北方郡姓相抗衡。加之悬隔日久，襄阳杜氏与北朝京兆杜氏本宗的关系相当疏远，因而缺少来自其它郡望宗亲的援助。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它家族，如隋初韦世康与韦鼎虽为同姓同僚，但二人因“宗族分派，南北孤绝，自生育以来，未尝访问”。后经隋文帝极力撮合，并“遣世康与鼎还杜陵，乐饮十余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以下二十余世，作《韦氏谱》七卷”。¹⁰³又如河东裴氏裴叔业、裴遂等房支，晋末宋初时属籍寿阳，由于南迁近百年，已经断绝了与河东原籍的联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因称寿阳裴氏为“南来吴裴”，以示与河东裴氏的区别。¹⁰⁴

永嘉之乱造成的士族宗族内部的“南北孤绝”现象，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在唐宋时期流行的杜氏宗谱中，杜甫一支多被遗漏，以至引起后世学者的疑惑，如北宋张洎《游城南记》说：“甫为预远裔，唐宰相世系多不载，不知何故。”¹⁰⁵宋人马永卿也曾对当时流行的一种《杜氏家谱》未将“杜甫一派收入‘五派之中’而大为慨叹：“岂以其仕宦不达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¹⁰⁶这或许也是杜甫一支入隋唐后缺少同宗援助、过早衰落的一个因素。

再有，从襄阳杜氏人物的个性特点来看，从杜叔毗到杜审言、杜甫，似乎都无法超脱精神自由与官场羁绊之间的矛盾，以致每每陷入困境，这也许就是这个家族所以诗人辈出而未能冠冕相继的一个原因吧。也正因为如此，杜甫一生一直生活在极度冲突的两个世界，即一方面在尘世中寻求诗意并诉诸于诗文，另一方面则终年挣扎于贫困潦倒之中。

余 论

——对襄阳杜氏家族历史命运的思考

襄阳杜氏是中古关中郡姓杜氏的一个特殊支系。它既不同于陈亡之后迅速衰落的吴姓士族，也不同于道地的山东、关中士族。它既是汉魏一流高门晚渡后遭受重大挫折的类型，又是在隋唐新的历史条件下由儒学世家向文学世家转化的类型。其宗族兴衰历程更为曲折，蕴涵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因此有必要予以概括和总结。

首先，文化传统是士族门阀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大支柱。即便是汉魏旧族，一旦失去了文化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逐渐丧失社会声望，从而由一流高门降为次等士族。永嘉之乱后，杜坦、杜骥兄弟流徙播迁，子孙寄身戎旅，风流儒雅之门风渐渐改变，至杜幼文辈，虽一时风云际会，却未能立足长久，终至子孙夷灭。相比之下，乾光、叔毗家族是襄阳诸杜中经学传统硕果仅存的房支，江陵之变后叔毗又继续得到北周朝廷的重用。可见大凡根基深厚的士族家族，都是有文化传统作为支柱从而获得了自身的不断发展的。

除文化因素外，作为北方晚渡士族，还存在着一个与江东土著世家大族和率先南渡的北方士族分割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永嘉之乱后，“中原冠带，随晋室渡江者百家”。¹⁰⁷这些携带宗族、部曲和宾客的“拓荒者”来到江南求田问舍，已经使广袤的原野开辟殆尽。待到刘宋以后，晚渡士族姗姗来迟，必然要面临如何猎取财富，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的问题。

¹⁰⁸因此，晚渡士族无论在经济上抑或在政治上，都表现出更强的进取性。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发展必然缺少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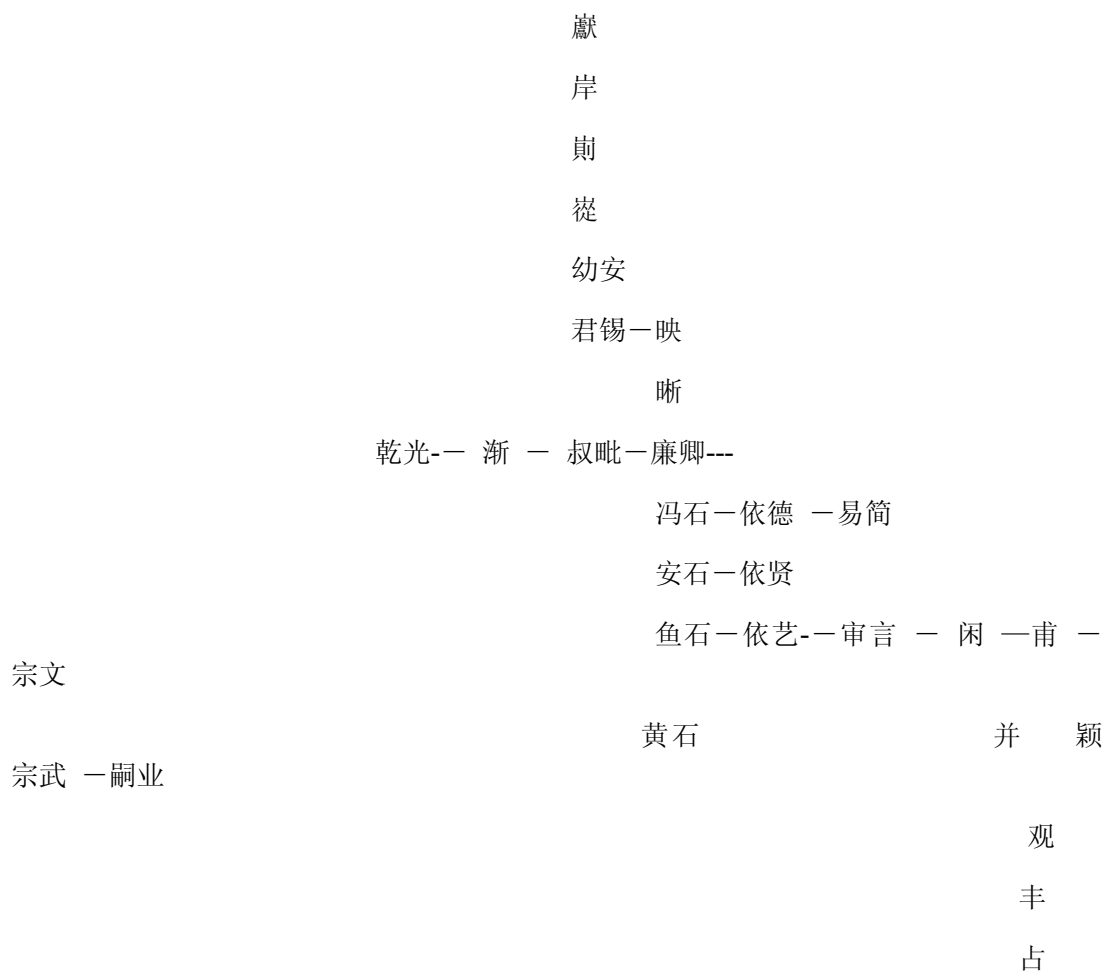
再有，与大多数晚渡士族一样，襄阳杜氏也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他们在地方上广占田产，拥有佃客和部曲，以及多少不等的私人武装。¹⁰⁹襄阳地区的其他侨姓士族也大都具备上述特点，他们在宋、齐、梁间一度意气风发，在中枢权力和地方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一旦家族的势力过于强大，表现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受到侵渔，朝廷绝不会容忍其无限度地膨胀，必定会给予致命打击，杜骥之子杜幼文房，以及杜灵启、杜怀珪诸子的毁灭都是典型的例子。

唐长孺先生在《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中说：“由于历史条件不尽相同，南北门阀也具有一些差异，因而在衰落过程中或早或迟。然而门阀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终究是一致的，因而也必然将按照历史规定的道路走向衰亡。”¹¹⁰襄阳杜氏杜审言、杜甫一支的衰落，发生在唐中叶政治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年代，因而更具有社会史意义上的个案分析价值。

中古社会宗族的发展，往往有赖于根深蒂固的乡村基础，而“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¹¹¹但我们如果将视野放大至百年、甚至千年的时空范围，就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古士族家族是在不断迁徙流动中发展的。襄阳杜氏本是京兆杜氏的分支，而后者于汉初崛起时，也曾是汉武帝从南阳迁至茂陵（以后又移至杜陵）“护陵”的豪族移民。同样，在东汉末年的流徙播迁中，京兆杜氏重又繁衍滋盛，成长为魏晋士族中的高门。从公元四世纪开始，杜预孙辈的两个房支，从长安到凉州，从关中到江汉，又从襄阳到洛阳，由弱到强，由盛转衰。襄阳杜氏的个案分析表明，迁徙是士族家族变迁史的一个永恒主题。迁徙意味着支系从本宗析出，由此产生新的郡望；迁徙意味着丢弃传统，锐意开拓；迁徙意味着经济开发，意味着文化传播乃至文学创造……这一切，都已在南朝至隋唐间襄阳杜氏的历史变迁中得到了印证。

附：襄阳杜氏世系总表：

	琬
坦	仲孺
	叔宝
	长文
	叔文
一口一口一 骥一	季文
	幼文
	希文
	怀珪 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文范…
……预 一耽 一 顾一逊一灵启一 怀珪 一嵩	
	岑一龛
	嶷
	岌



关于世系表的说明：

1、襄阳杜氏世系总表据《元和姓纂》卷6杜氏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梁书》《南史》杜崧传、《宋书》《南史》杜骥传、《周书》《北史》杜叔毗传以及《杜工部集》等综合整理而成。

2、据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甫自称为杜预“十三叶孙”；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係铭》亦云：“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推算起来，杜预、杜甫之间也是十三代。此外，在杜甫诗文中，常常提到“从弟”杜位，此人出自杜预另一子杜尹之后，乃杜希望之子、杜佑之兄。而据杜牧《自撰墓志铭》，杜位、杜佑一代为杜预十三代裔孙，这也可作为杜甫为杜预十三代裔孙的佐证。

The Du Family in Xianyang from the 4th to 9th century

Wang Liping

Abstract: The Du Family in Xiangyang was one of the particular branches of the prominent Du family in Guangzhou region. After the rebellion in the 5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jia (311), Du Dan, son of the Du Yu the famous general and scholar, adjourned south with his family and settled in Xiangyang. Gradually, the Du Dan family became famous and distinguished; there quite a lot of its descendants were known despots far and wide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occupying of power. There was only one branch Du Qiangguang who returned North joining again the ranks of the scholars. In years between the Han and Wei the descendants of Du Qiangguang moved to Luoyang and Gongxian, Henan province, then a family known to its literary genius came out of an old famous family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Du Sheyan was a Known pos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his grandson Du Fu was even more a genius poet bringing the Chinese ancient poetry to prosperous peak. Yet, the Xiangyang Du family was after all a non-local family which had gone through a unique experience and declined at last by the later Tang Dynasty. There must be containing rich historical content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wealthy family, a family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transmuting itself into a family of literary excellence.

Key words: family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family of literary;clan

收稿日期: 2000-9-12

作者简介: 王力平 (1958--), 女 (汉族),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历史文献学。

¹ 《元和姓纂 (附四校记)》卷 6 杜氏条, 中华书局 1994 年。

² 宋陈彭年《广韵》卷 3 “十姥·杜姓”。《广韵》本出于孙愐《唐韵》, 其有关郡望的记载基本上可视为 8 世纪中叶唐代郡望分布的客观记录。参考 (日) 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 (上) ——九·十世纪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 《东洋学报》1959 年, 42—3 号。

³ 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杜氏襄阳望就因袭了《新表》的说法, 只是在乾祚之后有大段脱文。又如宋马永卿《嬾真子》所征引之《杜氏家谱》, 也以杜佑一支为襄阳房, 而杜甫一支却未予收入, 与《新表》如出一辙 (以上两种史籍用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⁴ 孙星衍《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序》, 载《元和姓纂 (附四校记)》, 中华书局 1994 年。

⁵ 《全唐文》卷 477。

⁶ 《晋书》63《魏浚传》。

⁷ 《魏书》45《杜铨传附杜颢》。有关杜颢活动之时代及官爵, 诸史记载略有不同:《元和姓纂》称颢为“西魏安平公、雍州刺史、赠太尉”; 但《古今姓氏书辩证》则称颢为后周安平公、雍州刺史、赠太尉。今据《魏书·杜铨传附杜颢》及杜牧《自撰墓志铭》(《樊川文集》卷 10)之说, 颢为北魏安平公、征西将军, 后为安平公、赠太尉, 东魏初卒。

⁸ 《樊川文集》卷 10《自撰墓志铭》。

⁹ 《全唐文》卷 496 权德舆《杜佑遗爱碑》, 卷 505《杜佑墓志铭》。

¹⁰ 《文苑英华》卷 719。

¹¹ 《新唐书》201《文艺上·杜审言附易简传》。另据《太平广记》254 引唐人作品《御史台记》, 杜怀琬后裔杜文範也被时人称作“襄阳人”。据《新唐书·艺文志》,《御史台记》有韦述、韩琬著二种。上引杜文範条虽未详出自其中哪一种, 但韦、韩均为唐后期人士。

¹² 《晋书》34《杜预传》。

¹³ 《全唐文》卷 496 权德舆《杜佑遗爱碑》。

¹⁴ 有关杜预四子的排序, 诸史记载不一, 如:《元和姓纂》卷 6 杜氏条为锡、尹、跻、耽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 1994 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锡、跻、耽、尹,《古今姓氏书辩证》为锡、耽、跻、尹。据《晋书·杜预传》, 长子锡嗣爵, 故预四子排行惟长子锡可以肯定。其他三子排行, 暂从《元和姓纂》。

- ¹⁵ 《晋书》34《杜预传附杜锡》。
- ¹⁶ 《晋书》63《魏浚传》。
- ¹⁷ 《元和姓纂》6杜氏襄阳望。
- ¹⁸ 《晋书》86《张轨传》。按军司一职，为西晋改军师置，为军府主要僚属，佐主帅统带军队，监察主帅，地位重要，亦常继任主帅，杜预、卫瓘均曾由军司继任主帅（见《晋书·杜预传》）。然《元和姓纂》6杜氏襄阳望称杜耽为凉州刺史。或杜耽先为凉州军司，继为刺史。
- ¹⁹ 《晋书》103《刘曜载记》。
- ²⁰ 据岑仲勉考证，“乾元”应为“乾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6杜氏条，中华书局1994年。
- ²¹ 《四库全书总目》卷135《子部·类书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
- ²² 《宋书》65《杜骥传》，《南史》70《循吏·杜骥传》。
- ²³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²⁴ 《晋书》34《杜预传附杜锡》。
- ²⁵ 《晋书》65《王导传》。
- ²⁶ 《晋书》73《庾亮传附庾翼》。
- ²⁷ 《晋书》32《后妃下·成恭杜皇后》。又杜乂妻裴穆，为裴遐女（《晋书》32《后妃》下），而“裴王二族于魏晋之世”贵盛，“时人以八裴方八王……遐比王导”（《晋书》35《裴秀传》）。
- ²⁸ 《通典》177《州郡》七《古荆河州》。
- ²⁹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 ³⁰ 《梁书》18《康绚传》。
- ³¹ 详见《晋书》62《祖逖传》、94《徐邈传》。
- ³² 参阅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宋书》77《柳元景传》。
- ³³ 《宋书》83《宗越传》。
- ³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之《虞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襄阳的经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³⁵ 《宋书》81《刘秀之传》。
- ³⁶ 《宋书》6《孝武帝纪》，《宋书》79《竟陵王传》，《宋书》100《田子子亮传》。
- ³⁷ 《宋书》65《杜骥传附杜坦》。
- ³⁸ 《汉书》68《金日磾传》。
- ³⁹ 《宋书》65《杜骥传附杜坦》。
- ⁴⁰ 《南史》70《杜骥传》。
- ⁴¹ 《宋书》8《明帝纪》。按自东晋于襄阳置梁州后，具体辖区随北方胡羯势力的强弱而异，大约相当于今之鄂西、鄂北、陕南以及四川东北，梁州刺史的治所也以军事形势为准，或镇襄阳，或镇鄢，或镇安陆，或镇魏兴等地。参考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之《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 ⁴² 《南史》70《杜骥传》。
- ⁴³ 《宋书》87《殷琰传》。
- ⁴⁴ 《宋书》65《杜骥传》，《宋书》9《废帝昱》。
- ⁴⁵ 《梁书》46《杜崱传》。
- ⁴⁶ 《梁书》46《杜崱传》。
- ⁴⁷ 关于怀琚，《元和姓纂》记为岑、疑、嵒、岸、崱、幼安，而无嵩、岌、巖。今从《南史》64《杜崱传》。
- ⁴⁸ 《南史》64《杜崱传》。
- ⁴⁹ 据《梁书》46《杜崱传》，襄阳杜氏在平定侯景之乱过程中的作用和军功如下表：

人名	军政职务	因功获得封爵、食邑
杜巖	南阳太守	进爵侯，食邑1000
杜岸	平北将军、北梁州刺史	江陵县侯，食邑1000 户
杜崱	信威将军、武州刺史，后加侍中等	进爵公，食邑1500户
杜幼安	云麾将军、西荆州刺史	华容县侯，食邑1000 户
杜龛	东平将军、东扬州刺史	卢县侯，食邑2000户

- ⁵⁰ 《周书》48《萧詧传》。
- ⁵¹ 《南史》64《杜崱传》。

- ⁵² 《隋书》32《经籍志》云：《春秋释例引序》，齐正员郎杜乾光撰。此书唐时已亡佚。
- ⁵³ 《元和姓纂》卷6，《周书》46《杜叔毗传》。
- ⁵⁴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⁵⁵ 《梁书》28《裴邃附裴之横传》。
- ⁵⁶ 《周书》46《杜叔毗传》。
- ⁵⁷ 《周书》46《杜叔毗传》。
- ⁵⁸ 参阅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
- ⁵⁹ 《北史》63《苏绰传》。
- ⁶⁰ 《通典》卷14《选举》二。中华书局1988年。
- ⁶¹ 《通典》卷17《选举》五。
- ⁶² 参阅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又毛汉光对唐代若干士族籍贯变动过程进行考察，也得出了隋唐之际，“这些大士族之主要人物从各方面走向京兆、河南这条线上……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的结论（《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古社会史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 ⁶³ 王定保《唐摭言》卷2“悲恨”条；又如卷7“李义琛”条：“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从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邠城。国初，草创未定，家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按李义琰本是陇西著姓，后徙居河北邠城。唐初兄弟三人为追逐科第，随同上计吏经潼关入京赴选。义琰兄弟中第后，李氏家族也从邠城迁居长安。
- ⁶⁴ 《唐代墓志汇编》上长安007《大唐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⁶⁵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 ⁶⁶ 《北史》69《儒林传》序：“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晁公武、陈振孙、郑樵等，也都高度评价过杜预的《左传》注，见朱彝尊《经义考》，四部备要本。
- ⁶⁷ 《北史》69《儒林传》序。
- ⁶⁸ 《周书》46《杜叔毗传》。
- ⁶⁹ 《又示宗武》、《宗武生日》，《杜工部集》卷1（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 ⁷⁰ 《唐代墓志汇编》上长安007《大唐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⁷¹ 《新唐书》201《文艺》上《杜审言传附易简》，《新唐书》60《艺文志》。
- ⁷² 傅璇琮《唐诗人丛考·杜审言考》。中华书局1980年。
- ⁷³ 《新唐书》201《文艺》上《杜审言传附易简》，《新唐书》60《艺文志》。
- ⁷⁴ 胡应麟《诗薮》内篇；王夫之《薑斋诗话》。转引自《唐诗小集·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⁷⁵ 《唐代墓志汇编》上长安007《大唐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⁷⁶ 《壮游》（《杜工部集》卷6）；《进雕赋表》（《杜工部集》卷19）。
- ⁷⁷ 《新唐书》60《艺文志》。宋人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云：“杜甫本传（按应为《新唐书·艺文志》）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闷也！”（《苏舜钦集》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⁷⁸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⁷⁹ 《北史》85《节义·杜叔毗传》。
- ⁸⁰ 杜甫《送重表侄王砮评事使海南》（《杜工部集》卷8）诗对杜鱼石女的侠行义举有生动记载：
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
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
陈剪髻鬟，鬻市充杯酒……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称万寿……
按“我之曾老姑”，应即杜甫曾姑祖母、隋怀州司功、获嘉县令杜鱼石之女；“尔祖”与“尚书”当指同一人，即王砮高祖、唐初尚书王珪。时王杜两家已结为姻亲。
- ⁸¹ 《杜工部集》卷20《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君子以为鲁义姑者，遇暴客于郊抱其所携，弃其所抱，以割私爱，县君有焉。”
- ⁸² 《唐代墓志汇编》上长安007《大唐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新唐书》201《文艺》上《杜审言附传杜甫》。
- ⁸³ 《新唐书》201《文艺》上《杜审言附传杜甫》。
- ⁸⁴ 《杜工部集》卷20。据钱谦益考证，此志为天宝三年杜甫代其父杜闲所作，甚是。
- ⁸⁵ 《全唐文》卷230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铭》。
- ⁸⁶ 并、专早卒，并未婚，专婚否不详。但据《杜工部集》卷20《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除“冢妇”杜闲妻外，尚有“介妇”郑、魏、王三人，估计为杜审言子专、登等人的妻子。
- ⁸⁷ 《元稹集》56《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中华书局1982年。
- ⁸⁸ 《杜工部集》卷1。
- ⁸⁹ 杜甫曾外祖一辈曾与李唐宗室联姻，见杜甫《祭外祖祖母文》（《杜工部集·补遗》）、张说《赠陈州刺

史义阳王神道碑》（《全唐文》卷 230）。参阅陈诒焮《杜甫评传》（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⁹⁰ 毛汉光氏在考察隋至唐前半期（即安史之乱前）关中郡姓的婚姻关系时，曾得出“关中五郡姓（韦、裴、柳、薛、杜）间联姻极为广泛……所以没有形成一个僵化的硬壳”的结论，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毛氏同时又认为：“关中五郡姓没有与山东五大姓通婚”，两者之于婚姻方面，“在安史之乱前仍存在著界线”的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从上述襄阳杜氏个案中可知，这种现象并不存在（毛汉光《关中郡姓婚姻关系之研究》，载《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7 年）。

⁹¹ 《旧唐书》155《崔郾传》。

⁹² 《南部新书》己卷。转引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之《隋唐五代时的阶级分析》，三联书店 1979 年。

⁹³ 傅璇琮《唐诗人丛考·杜审言考》据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杜审言小传“杜审言咸亨元年宋守节榜进士”。中华书局 1980 年。

⁹⁴ 《旧唐书》78《张行成传附易之》，《新唐书》201《文艺》上《杜审言传》。

⁹⁵ 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文苑英华》卷 978。

⁹⁶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工部集》卷 1。

⁹⁷ 《进雕赋表》，《杜工部集》卷 19。

⁹⁸ 开元二十九年，杜甫由齐鲁归洛，曾“筑室（即陆浑庄）首阳山下”，即《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杜工部集》卷 1）原注所云“甫故庐在郾师”。又仇兆鳌同诗注引黄鹤说云：“诸杜庐与墓，多在河南郾师。”从甫继祖母卢氏、审言与妻子裴氏、卢氏以及甫本人均葬郾师来看，襄阳杜氏在此地应有宗族田产或庄园。天宝十载，杜甫移居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其所作《秋日夔府咏怀》诗云：“两京犹薄产。”又《曲江三章章五句》称“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云云。

⁹⁹ 《示从孙济》，《杜工部集》卷 1。

¹⁰⁰ 《新唐书》201《文艺》上《杜审言传附杜甫传》。

¹⁰¹ 关于杜甫死因和葬地，宋以来即为聚讼之点。本文从《新唐书》及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係铭并序》说，即卒于耒阳，后殡于岳阳，再由嗣业迁葬偃师。

¹⁰² 杜甫有子宗文、宗武，亦贫困潦倒，流落湖、湘（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宗武子嗣业之后，子孙史传无名。在宋人文献中，尚可见到有关杜甫后裔的记载，如《宋史·杜莘老传》称莘老为杜甫 13 代裔孙；又王十朋有《杜御史（莘老）墓志》，查翥有《杜御史莘老行状》等等，记述宗文后人的情况。本文未涉及五代以后杜甫后裔的情况，暂备考。

¹⁰³ 《隋书》78《韦鼎传》

¹⁰⁴ 韩树峰《河南裴氏南迁述论》，《中国史研究》1996 年 2 期。

¹⁰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三》，中华书局。

¹⁰⁶ 马永卿《懒真子》，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¹⁰⁷ 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北齐书》45《文苑·颜之推传》。

¹⁰⁸ 《南齐书》14《州郡志》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奏书。

¹⁰⁹ 参阅陈琳国《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4 期。

¹¹⁰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 年第 8 期。

¹¹¹ 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5 年。